

从“同情文学”到“阶级意识”的文学

——1920年代革命文学情感模式的生成与嬗变

张广海¹

【摘要】文学与“同情”在中国语境下联姻，始于近代。白话新文学诞生后，高度重视情感表达，“同情”也逐渐被视作文学的重要功用。进入1920年代，蓬勃发展的革命文学，更是普遍地诉求人性的情感共鸣，以唤起革命的“同情”之心为目标，乃至滥为俗套，被鲁迅讥为“同情文学”。国民革命之后，无产阶级文学登上历史舞台，对既有革命文学进行了猛烈批判，明确提出以“阶级意识”作为革命文学的核心内容。新革命文学的情感表达模式发生重要变化，人性的普遍性要素在其中被彻底解构，阶级意识取而代之。这一变化，在创造社的转变中有最鲜明的体现。而对两种革命文学模式都不满意的鲁迅，其实也受到这种转变的深刻影响，其革命文学观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关键词】同情文学 阶级意识 革命文学 后期创造社 鲁迅

文学，难免诉诸情感。而情感之发动，既依赖外缘刺激，也依赖一种情感本身的作用机制，即“同情”。同情，普遍被视作社会交往赖以产生和维系的根本要素，其实，它也是文学能够发挥效用的前提。若无同情，文学如何能被他人体味？又如何能兴观群怨？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情的关联，历来论述众多，而文学与同情明确发生关系，却似乎始自近代。这当然也因为，“文学”（literature）和“同情”（sympathy）都是近代西洋舶来的概念，但是，二者之发生关联，实在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国人情感模式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因此让文学生出新的特质。当革命话语兴起之后，二者的联系愈发密切，革命文学一度以普遍同情的产生为最主要的诉求，直到阶级革命话语强势崛起，“同情”的暧昧面目才变得不合时宜，甚至被严厉批判，普遍同情进而被阶级意识取代。普遍人性由此被解构，而迈向分裂的阶级性。

一、“同情”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同情，并不是一个新词语。《韩非子·扬权》有言：“参名异事，通一同情。”《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说：“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后汉书·马援传》亦有言：“四海已定，兆民同情。”不过，作为古汉语词汇的“同情”，与今日所言的同情，含义上有不小的差别，主要指同一性质，或同心同气，或同谋、常情等，并没有今日习见之“对于他人的遭遇或行为在感情上发生共鸣”的含义，其中“情”之所指，很少“感情”的意味。^①据《全国报刊索引》、《瀚堂近代报刊》等数据库检索结果，“同情”一词首次出现于近代中文报刊，大概是在英国伦敦布道会所属英华书院创办的刊物《遐迩贯珍》上。^②1855年该刊所载的一篇题名《手鼻口官论》的文章，在论述了手、鼻、口等器官的特性之后，发出如下劝谕：“中土有圭玷之诗，西国有马衔之训，劝善惩恶，万国同情，溯本寻源，四海一脉，愿诸君子，常凛瓶城之守，毋污脑殿之君，而为造物主所不容也。”^③这里的“同情”，意思便是同一情形。1870年代始，“同情”才开始较多出现于报刊中，最初集中于《申报》。但细察《申报》在其后数年间的用例，多数含义都没有逸出传统范围。比如1872年9月5日刊载的《戒食鸦片烟时文》有言：“好生者，人之同情也。”^④“同情”显系常情之谓。同年7月19日的一则用例乍看接近现代含义：“今海上病疫盛行，逐日毙命者不一而足，痛惜之心，彼此谅有同情也。”^⑤细察亦知是对某种共同情形的概述，与今日习见的含义不同，但在其中，又确乎被语境传递了感情色彩。1872年由传教士丁韪良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闻见录》中亦有多则“同情”用例。其中一则系对农业

¹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与日本思想场域之关联研究”（16CZW059）阶段性成果，并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生产情形的总结：“天下万国有同情也。”⁽⁶⁾另一则是对纯粹生理现象的设想：“虽中西之远，当必有同情者焉。”⁽⁷⁾都完全与“感情”无涉。

但起码在《申报》上，不久后“同情”一词便开始较为密集地出现于对灾难、饥荒、疾疫、死亡等的报道和书写中。虽然“同情”基本上仍不是现代含义，但正如前引词例所示，逐渐沾染上较强的情感色彩。譬如1876年报道文祥去世，其中说：“中外之人，闻之无不扼腕，想他处亦必有同情也。”⁽⁸⁾而1877年在劝谕赈济山西灾民的文章中说：“而尤愿远近诸君，闻风兴起，节一身家之浮费，推己饥己溺之同情，踊跃输将，不少怠缓。”⁽⁹⁾“己饥己溺”出自《孟子·离娄下》。此例中“同情”关联着一种恻隐之情，含义乍看同于今义，但其实所指涉的仍然是一种同理心和常情。1882年秋，皖浙川赣四省水灾，京城秋试及第者成立拯溺会，募捐文字在谈到水灾惨状后也指出：“己饥己溺，谅有同情。”⁽¹⁰⁾“同情”虽也不同于今义，但已然都包含了很强的在情感上推己及人的意味。

1878年，在向山西灾区捐款的劝谕文中，主事者在文末指出：“将见泛舟振廩，同人均有同情；救灾恤邻，厚谊自征厚德也。”⁽¹¹⁾这里的“同情”，主要意指同谋共划，但也很难说没有“共同感情”的意味。另有多处用例明确指出，恻隐乃是一种“同情”。1882年的《劝收埋枯骨兼育婴施诊启》中说：“盖闻恻隐本有同情，幽明初无二理。”⁽¹⁾1885年，上海某品牌火柴欲更改包装，在声明中强调：“再三筹划百计图维，恻隐则心有同情，美善则憾无良法。”⁽²⁾1887年，黄河决口，酿成直隶、河南、山东等数省的特大水灾，持续数年，灾情惨重。社会各界向灾区发起的赈灾募捐册便取名“拯急同情册”。这部“同情册”在1888年的《申报》上起码出现了14次。⁽³⁾1895年的一则募捐文章，直接向《申报》读者呼吁：“俾阅报诸大君子之具有同情、慨发善愿者，仿而行之。”⁽⁴⁾因为“同情”开始频繁地和赈灾济困联系在一起，在传播效果上，它就难免会具有怜恤的意味，指向一种困苦与共之情，而溢出“相同情形”或“同谋共划”的含义范围。

中国近代多灾多难的现实无疑推动了“同情”一词在更大范围的使用，并促使其朝向“怜悯共情”的方向发展，从而产生较为典型的“语义韵律”（semantic prosody）现象。但就接近“怜悯共情”来讲，尚有不小限度。更普遍的变化，集中于“同情”一词的感情化和感觉化趋向上。仍以《申报》为例，1876年刊发的时论《论女学》，在痛诋了时人对女子的陷溺后反问：“人之爱子，有同情也，溺之何为？”⁽⁵⁾1879年的一篇报道则有言：“舐犊之爱，人有同情然。”⁽⁶⁾“同情”虽都指常情，但指向的是“爱”。在《申报》当时刊载的诗歌中，有两首都是读了他人诗歌后，“不禁有同情之感”而作。⁽⁷⁾“同情感”或“同情之感”的说法，在古典文献中，几乎完全未见。⁽⁸⁾这应该是因为，“同情”一词在古典含义中，和今日的“情”与“感”都关系不大。

“同情”真正迈出现代化的关键一步，立宪派与革命派在日本创办的刊物起到了重要作用。1902年10月31日，《新民丛报》刊出梁启超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第九章，介绍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顺带提及了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感情论》（今译《道德情操论》），称此书所论，“盖以伦理学上同情主义为基础”。⁽⁹⁾此处之“同情”，显然完全是个现代概念。1903年9月5日，《新民丛报》又刊出内明所撰《心理学纲要》。在谈到心理学研究的“主观法”时，作者指出：“记忆、判断之为何物欤？忿怒、同情、希望、决意之作何用欤？征诸一己之经验，方能知其所以然，外无可测知之捷法也。假与一毫无同情者终日相对，决不能表白同情为何物。”在讲到“主观法”的缺点时又以“同情”为例：“即富于同情者以为无论何人皆富于同情，短于记忆力者以为无论何人皆短于记忆力之类是也。”⁽¹⁰⁾以上两例虽然都未专门界定和解说何谓“同情”，但“同情”无疑都是sympathy的对译，而之所以选用“同情”，学界普遍认为是接受了日本已有的译法。⁽¹¹⁾但据上文分析可知，“同情”在近代中国逐渐发生的语义重心偏移，其实已经给这种译译做了铺垫。

上两例“同情”大体还只是作为译文而存在。比《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略晚，由中国留日学生湖北同乡会创办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在1903年2月便有文章使用了大致接近现代含义的“同情”。在《宪政平议》一文中，作者如此表彰了欧洲国民追求宪政的努力：“独是欧洲国民，洒尽同情之泪，流遍大陆之血，企望之不己而要求之，要求之不己而抗争之，千辛万苦千辛万辛，以购得此宪法之政治，则所谓宪政之价值，必其实足以偿此者也。”⁽¹⁾“同情”的对象虽未指明，但显然主要指向国民在专制政治下的悲惨遭遇以及为追求宪政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两个多月后，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创办的革命刊物《浙江潮》在表扬俄国民意党的女性时说道：“谁谓脂粉丛中、绮罗队里，不可以演此龙拏虎攫、电掣雷轰革命之壮剧乎？吾安得

不顾吾同胞姊妹，而为洒一掬同情之泪也。”⁽²⁾1904年，《新民丛报》刊登《日俄战记》，作者被日本国民听闻俄国将领战死、战舰沉没后的复杂情感所动，于是：“虽我中立国之一旁观者，当此亦不能不向彼人的、物的两英雄，洒一掬同情之泪也。”⁽³⁾1906年，“同情之泪”的表述也出现在了梁启超笔下。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梁启超虽反对革命党之主义，但更意在痛斥清廷已成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今而曰：‘务杀而已。’《传》曰：‘尽敌而反，敌可尽乎？’徒使革命党以外之人，犹不免洒一掬同情之泪于彼辈，而对于政府，增恶感焉。”⁽⁴⁾这些“同情”，都鲜明指向对弱者的感情共鸣和怜悯。“同情之泪”（或“同情泪”），逐渐成为了20世纪中文的一个重要表述。在20世纪之前的文献中，“同情”与“泪”还从未联系在一起。⁽⁵⁾

不过，“同情”的传统含义并未退场。“同心同气”和“同谋共划”的意味在已经获得了几乎是全新特质的“同情”中仍然普遍存在，只不过其强度弱化了。这鲜明表现为，进入20世纪，“表同情”的说法几乎从无到有突然出现，迅速获得很高使用频率，一直维持到1930年代中后期。⁽⁶⁾而“表同情”的主要含义便是赞同、支持，而并不必然指向弱者；一旦指向了弱者，传统与现代的两种含义便难免纠缠在一起。而且可能正因为这种纠缠，使得同情在不久后便在革命语境下快速流行了起来。而在日语和韩语中，“同情”并不具有赞同和支持的意味。有日本和韩国学者认为，汉语中“同情”的这两种含义是对立的。⁽⁷⁾其实倒未必然。当弱者的不幸和痛苦演化为他们推翻专制、打倒强权、实现正义的抗争——也就是革命——的时候，“同情”便无论在哪种意义上，都显得十分必要了。⁽⁸⁾

二、革命文学与“同情”的联姻

革命与文学正式联姻，并出现“革命文学”的提倡，固然和新文化运动极大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有关，但直接的起源则是1920年代蓬勃展开的国民革命。也正是在这一场革命中，“同情”的作用获得空前强调。于是，革命、同情和文学逐渐有了三位一体的奇妙联动：革命当然是目的，而同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要前提，其重要性强于理论或理性的认知，文学又是同情能够广施于众的最重要工具。所以革命依赖同情，同情又依赖文学，而能够有效实现同情与革命之目的文学，便是“革命文学”。

1920年11月18日，国民党主导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陈望道的评论《反抗和同情》。陈望道文中明确提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改革家（陈文称作“改造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是不是“劳动者底同情者”，因为：“凡是我们底同情者，必定是劳动者公共敌底反抗者；劳动者公共敌底反抗者却不定就是劳动者底同情者。”⁽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甄别混入革命阵营中的投机分子。“同情”的心理因此是比“反抗”的行为还重要的检验真假革命者的标准。“同情”的意义可见一斑。

陈望道此文发表后，有位读者读后“完全同先生共鸣”，而且“感情不能自止”，所以写了一篇回应文章。他指出，智识阶级中许多提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根本没有对劳动者的同情，而要真正同情劳动者，应该到他们中间去，“去与平民为伍”。⁽²⁾由陈文到此文，有意味地揭示了一条走向革命的正确路径：由真正的同情到投身于民众当中。

自然，对“同情”一词古今语义的杂糅，陈望道虽未必有明确的意识，但有明白的表达。其1922年发表于《觉悟》的随感《同情和合一》云：

因社会底进步，现在已有许多同情于妇女和劳工的人。和那反动者比较起来，这许多自然要算是进步的人们了。然而同情于妇女和劳工的同情不就是同情于乞丐的“同情”，换句话说，不就是可怜的意思么？君子从不受人怜，妇女和劳工，可都是小人，可都愿受人怜而感激那同情者么？

我知道你们所要求者是合一而非同情；所以各阶级的温情主义也就是你们深恶痛绝的标的。⁽³⁾

陈望道认为，对于受压迫者的“同情”，正确的做法是只取“同情”的“合一”含义，而舍弃其怜悯的意味。不过他是从

高扬被压迫者主体尊严的角度立论的（其中或有尼采的影响），显得太高蹈，自然也难以被同侪广泛认可。就在《觉悟》中，其他作者还是普遍把“同情”施予弱者。比如对于被压迫劳工，晓星认为：“可怜们受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现在已被逼到最危险的地位了。人类是应有同情心与自卫心的；寻常见到恃强凌弱的事，还该出来讲几句公道话……”⁽⁴⁾

《觉悟》在1922年12月还刊发了一篇题名《同情》的小说。故事很简单，一个叫琴儿的孩子，看到父辈猎回的“无辜受死的禽兽们”，动了恻隐之心，“脸儿一沉，眼儿一红，哇的一声便哭起来了”，于是便在夜间偷偷把一只活的山鹑给放了。父亲发现猎物少了，但不明真相，便把仆人臭骂了一顿。⁽⁵⁾这里的“同情”，显然也完全是怜悯的意思。在同期《觉悟》上，另有一首题名《同情的寻觅》的诗歌，对被猎杀的鸟儿和被钩钓的鱼儿寄予了深深的同情。⁽⁶⁾《民国日报》另一副刊《平民》则有一篇随感指出，同情已经被金钱侵蚀殆尽，而同情乃是人之“本心”，只不过由于社会的压迫，才到如此的局面。⁽⁷⁾显然，作者呼吁同情的恢复，并把目标指向社会改造。

应该说，对于文学“同情”功能的强调，和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新文学诞生伊始，就格外重视“情感”功能，真挚且普遍化的情感被认为是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特征之一。⁽⁸⁾而对于有志于社会改造或革命的文人，文学的情感激发功能，决定了它对革命的意义。

1921年，《文学旬刊》刊发了郑振铎的文章《文学与革命》。文中，郑振铎首先援引了费觉天的信件。费觉天感慨“五四”后青年很快消沉，而青年的奋发，不能依赖理性批评，必须依赖感情激发，文学则是激发感情的重要工具：“好比俄国革命吧，假使没有托尔斯泰这一批的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扎维克’恐也不能做出什么事来。”所以现在中国最为迫切的便是“产出几位革命的文学家”，“激刺大众底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郑振铎完全同意费觉天的意见，继而指出，“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就是感情的事”。革命起于“因为痛恨人间的传袭的束缚，所以起了自由的呼声；因为看了被压迫的辗转哀鸣，所以动了人道的感情。”文学的作用就在于从感情方面“叫人不假思索而引起本心的同情与愤怒之来”。⁽¹⁾

1923年开始中国的“革命文学”提倡渐入高潮，并和对“感情”作用的强调紧密结合在一起。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开始在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热烈提倡文学的革命作用。他们提倡的要点是文学承担起社会改造的使命、文学家积极投身革命，诉诸的重点也在“感情”方面。比如恽代英强调文学是“人类高尚圣洁的感情的产物”，所以文学家必须“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你的革命的感情”，才可能创作出“革命文学”。⁽²⁾在《觉悟》副刊方面，因为1924年国共合作已经展开，国民革命推行，国民党的宣传活动日趋正规化⁽³⁾，《民国日报》也成为了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觉悟》上出现了一大批明确提倡“革命文学”的宣传文字（如其中一篇便题名《请智识阶级提倡革命文学》⁽⁴⁾），国共两党成员都大量在其中发表文章。对革命文学的提倡仍多依据于感情具有胜于理性的力量。比如当看到叶圣陶在《文学旬刊》上提出革命者更为急需，革命文学不必刻意鼓吹，革命者的作品无不含有革命的意味⁽⁵⁾时，中共党员许金元便在《觉悟》上批评叶圣陶，指出，“理智”只能告诉人们该不该做一件事，而能决定去不去做的只有“情感”，“文学底原动力正是情感”，所以提倡“革命文学”是造成革命者的重要途径。⁽⁶⁾几乎完全是费觉天和郑振铎观点的翻版。另一位中共党员沈泽民则特别看重了革命文学在“同情”民众痛苦的基础上统一民众情绪的作用：

文学者不过是民众的舌人，民众的意识的综合者：他用锐敏的同情，了澈被压迫者的欲求，苦痛，与愿望，用有力的文学替他们渲染出来；这在一方面，是民众的痛苦的慰藉，一方面却能使他们潜在的意识得到了具体的表现，把他们散漫的意志，统一凝聚起来。一个革命的文学者，实是民众情绪生活的组织者。这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在这革命的时代中所能成就的事业！⁽⁷⁾

把革命文学的作用界定为统一和激发民众的革命情绪——即作为“合一”的“同情”，可谓大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宣传的普遍内容，后来在太阳社那里也有突出表现。太阳社虽然成立于大革命之后，但其主力成员大都深度参与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活动。1928年，他们创办《太阳月刊》，重点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其革命文学主张，仍然基本上是以诉诸感情的共鸣为要旨。比如“情绪”是蒋光慈文艺理论的核心词汇，在他看来，培养革命情绪的意义超过理性，情绪关系到对革命的同情，

关系到革命文学的创作：“在情感方面说，我们的作家与旧世界的关系太深了，无论如何，不能即时与旧世界脱离，虽然在理性方面，他们也时常向着旧世界诅咒几句……这是因为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没有对于革命的信心，没有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但是缺乏这些东西，是写不出来革命的文学作品的。”⁽¹⁾太阳社另一主力钱杏邨，对“情绪”的作用同样重视，而“情绪”指向的目标，便是“革命的同情”：

狂热的革命群众的革命情绪的高涨，革命文学的作家能不受一点激动吗？能不唤起作家对于革命的同情么？在写作的时候，没有革命的情绪，笔下究竟流出什么东西？没有革命的情绪，怎么会有对于革命的同情，没有对于革命的同情与信心的人真能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的创作么？⁽²⁾

与此同时，创造社也开始从一个提倡天才、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社团向“革命”转变，成员陆续投身大革命的浪潮当中，理论主张也偏向到革命文学方面来。创造社在1928年“方向转换”前，理论主张一直缠绕在功利与非功利的复杂关系中，其转向国民革命不宜被视作一种突变，而更应被视作理论主张自然发展的结果。对艺术的审美本性、情感功能及社会效益的同时强调，是多数成员1928年之前一以贯之的观点。郭沫若1923年5月2日在上海大学的讲演便格外强调了艺术的“同情”效用：“艺术可以统一人们的感情，并且引导着趋向同一的目标去行动。”这是因为“艺术的根底是立在感情上的，感情是有传染性的东西”。他举“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的例子指出，“这完全是受感情之传染而生的同情心”。显然，文艺的目标便是激发同情，引导人“趋向同一的目标去行动”。⁽³⁾而成仿吾在同一年作文《批评与同情》，特别要求批评家要对作品或作者“抱有热烈的同情”，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只有“同情”才能真正感触到作者的“观念情绪”。⁽⁴⁾当然不仅“批评”如此，1924年成仿吾作文指出，艺术的价值便在于“同情的唤醒”和“引导生活的向上”。⁽⁵⁾

当创造社成员开始提倡革命文学时，仍然致力于从人性和情感的层面来立论。比如成仿吾给革命文学做出的公式是这样的：

（真挚的人性）+（审美的形式）+（热情）=（永远的革命文学）⁽⁶⁾

而郭沫若也把革命文学看做实现感情之共鸣的重要工具，并把情感的强烈和普遍程度视作判断革命文学优劣的标准：

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在读者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那么作家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这样的作品当然是好的作品。……革命时代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最强烈最普遍的一种团体感情，由这种感情表现而为文章，来源不穷，表现的方法万殊，所以一个革命的时期中总含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了。⁽⁷⁾

“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当然就是“同情”，但这里的同情其实和 sympathy 已经有了不小差别，和同情的传统含义当然差别更大，而更接近于现代含义的同情与传统含义的同情的混合体，更接近于“共情”（empathy）。这种“共情”，显然是“同情”脱去了内含的消极意味，而只剩下积极目的产物。“同情”所呼吁的，是情感的统一和共鸣，以便完成革命的任务。这种“同情”是1920年代前中期热烈的革命文学宣传的核心内容。而这种革命文学，虽也时常混杂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原理，但大都仍然以诉诸人性的情感共鸣为要旨，并难免有泛滥成俗套的趋势，以致不久后便被鲁迅讥为“同情文学”。⁽⁸⁾它们的理论命运，大体上终结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

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阶级意识”对“同情”的取代

1927年约10月，成仿吾亲赴日本为创造社引进了朱镜我、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他们不久后就成为创造社的骨干，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对文坛展开全面批判，开启了后期创造社时期。成仿吾是后期创造社早期主要负责人，也获得新进成员的尊重，但他们并不满意成仿吾的革命文学公式。据李初梨回忆，批评成仿吾革命文学观的文字已经写成，但被成仿吾看校样时给剪掉了。⁽⁹⁾

依据后期创造社的理论，无产阶级文学已然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革命文学。如李初梨所言：“革命文学，不是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历史的内在的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³⁾后期创造社杂取了日本、欧洲、美国和俄国等多种路径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思想谱系虽然驳杂，但有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调，在方法论上主张辩证法，而在主观意识上，格外强调阶级意识的重要性。⁽⁴⁾在后期创造社的大力宣传和提倡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获得普遍推广，无产阶级文学、唯物史观、辩证法、阶级意识等观念快速在知识阶层中流行了起来。应该说，后期创造社能取得如此大的影响，主要在于其理论主张契合了已然受到革命洗礼，而革命激情又被强行抑制，一时思想混乱、前路迷茫的文坛需要。

主力成员大都未受大革命洗礼的后期创造社探察此前的革命文学，自然发现其对“同情”之功能的提倡难以符合唯物史观。依据马克思主义，文学的产生依赖于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属于被决定者，而感情几乎处在决定论链条的末端，如何有可能决定文学的产生、并具有超凡的力量？而依据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同情”更难免是没有阶级性的虚假人性论的体现。

后期创造社在论述革命文学时，自然会追查背后的决定者——时代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再落实到社会关系层面，则是阶级斗争。要证明革命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则须证实文学乃是社会条件与阶级斗争的决定物。李初梨在谈到资产阶级文艺批评有倾向于客观与主观两种方法时，即设问道：

那么，普罗列塔利亚文艺及批评，在这两种对立的范畴间，是应该属于那一种？

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们所能任意选择，而因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底种种条件所决定的。⁽⁵⁾

从“社会底种种条件出发”，李初梨认为“一切知识分子”、“一切精神的活动”都应该集中在“普罗列塔利亚解放底这一点”，也就是说，都和阶级斗争有关。他由此得出“艺术是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⁶⁾的观点。对艺术作用如此高度的强调或许和唯物史观有些隔阂，但不难看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证成之途。冯乃超依照相同逻辑的论证则更加细致。在长论文《文艺理论讲座》一开头，他即重点讲解了“文艺和经济的基础”之间的关系。他首先批驳了“文艺是人性的表现，时代精神的表现”等许多主张的“漠然不切实”，“对于文艺之历史的发展的盲目”。⁽⁷⁾物质生产固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冯乃超援引马克思的论述，主张以具体的历史形态为中介来认识文艺：

要想观察精神的生产与物质的生产之关系，最要紧的不是单以物质的生产当作一般的范畴就算了事，却有在一定历史形态里去把握物质的生产之必要。所以，例如资本家的生产样式与中世的生产样式对应着别种不相同的精神的生产。若不在它的特殊的历史形态去理解物质的生产本身，那就不能理解与物质的生产相对应的精神的生产之决定者及双方之互相作用。⁽¹⁾

冯乃超把历史形态作为文艺产生的原因，克服了追查经济基础将导致的过分间接，使得论证更有说服力。但是冯乃超把具体的历史形态等同于阶级分裂和斗争，则又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点：“精神上的斗争，嗜好趣味之不同，这些现象都依存于阶级的分裂这事实里面。除原始社会以外，如果离开在社会内部之阶级斗争，当然不能够理解这社会内之精神种种现象。阶级斗争使各阶级的心理受其影响。”⁽²⁾正是从这种论证理路出发，冯乃超明确提出文艺的属性取决于统治权力：“人类的历史如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末，艺术的变迁当然是时代之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之写照，正因为这样，我们以统治的权力去称呼特定时代之占有势力的艺术。”⁽³⁾

阶级文艺当然也追求组织感情，但不同阶级属性的艺术显然是对立的：“艺术是感情社会化的手段，组织感情的方法，某一阶级用它来维持其统治，而某一阶级则用它来求解放。”⁽⁴⁾那么，“发扬人性”的“人类底艺术”可能存在吗？在批评向培良的人性论艺术观时，冯乃超指出，只有等到“没有阶级的分裂”的“美好时候”（即共产主义社会），当“人类整个‘意识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够存在。而现在，必须“经过阶级艺术的过程”。⁽⁵⁾

在上述论证中，文学的属性被具体的社会条件——阶级斗争所决定，文学不能脱离阶级斗争，所以文学必然从属于某一个

阶级，或是统治阶级、或是被统治阶级。在阶级社会，跨越阶级的文艺和情感都难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要而言之，文学是时代的决定物，时代既经给定，文学难逃革命的任务与阶级的属性。自然，这种对文学的合法性要求既奠基于时代、物质以及阶级决定论，也难免经常深切地联系于文学的伦理准则。对于深度参与了大革命的文人来说，尤其如此。比如潘梓年也认同“文学这东西，完全是时代思潮和现实生活互相激荡出来的”，虽然文学有超越于生活的意义，但仍然是被时代所决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应讲不应讲决不以其名称的刺心与否做条件，要以其本身是否是思潮的飞沫，生活的反映来决定。”⁽⁶⁾所谓“思潮”，指的是阶级斗争学说；所谓“生活”，则指中国的阶级存在，这些在潘梓年看来都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产阶级文学不容否定的根本所在。但是，在他看来，或许更足以说服人的论证方式仍是诉诸道义和“同情”：

所谓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也不过是说，文学者今后应当集中其注意，贯注其精神，于那些大贫人的生活状态，用同情的笔尖尽量地表现出他们的意识，使袞袞诸公有所借镜；不要再象先前那样，只沉溺在所谓伤感，趣味，享乐等等个人主义的挥发中……⁽⁷⁾

在另一位疾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黄药眠笔下，革命文学的“人性”特质被保留得更为明显。在呼吁艺术家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来，创作“表现出无产者的疾苦、提醒他们阶级的意识”的文学时，黄药眠选择诉诸“人的心肠”：

在这一方面是一些终日在工厂里匍匐蠕动，汗流浹背，面目熏黑的工人，一些衣衫褴褛，胼手胝足，终日牛马般在田里工作的农人，和一些僵卧在贫民窟里的草荐上，以拾着残羹冷饭为生的穷汉；而在那一边则是一些锦衣玉食，口含雪茄，手挥 Stick 日出入于舞场戏院顾盼自豪的富人公子。……假如他（艺术家——引按）都真的还有人的心肠，那么我们就唯有请他到这边来，同工人农人的利害结在一起！⁽¹⁾

论述虽然立足于阶级分裂的前提，但背后预留了一块未被分裂的人性领域，因而难免和冯乃超的论述存在龃龉。最后向“人的心肠”发出呼吁，殊不知阶级理论首先要解构的便是普遍的“人的心肠”，而代之以各阶级自己的心肠。这或可说明，投身革命可能并非主要出于对阶级理论的信仰，“同情”也与有功焉。诚如郑振铎所言，投身革命多因“动了人道的感情”，“至于因确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趋向于社会革命的路上走的，恐怕是很少”。⁽²⁾

“同情”虽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助力，但在文学的阶级特性日渐分明之后，在阶级情感分裂理论成为革命的原动力之后，若仍不加限定地施用，将难逃被批判的命运。比如到了1930年，在鲁迅主持的刚成为“左联”机关刊物的《萌芽月刊》上，复旦大学旁听生程沙力先引述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在课堂上拥护大众文学的言论：“能使‘大众’发生同感的，这作品必然是‘超阶级的’”；继而批判道：这种言论属于“盲目的喊着大众”，源于他“一味的阶级性的隔漫”。⁽³⁾

鲁迅对流于俗套的革命“同情文学”绝无好感，但他也是后期创造社最大的论辩对象，数次嘲笑他们的阶级意识理论。那么，他会反对阶级意识的文学吗？

阶级意识的文学能否成立的核心，就如鲁迅所敏锐感觉到的，在于阶级时代是否存在跨阶级或说超阶级的共同人性。在1928年，这是他思考的焦点。针对日本学者林癸未夫批判唯物史观否定共同人性的存在，鲁迅认为唯物史观并不如此简单，他特别强调存在三个不同的概念——“个性，共同的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并指出在中国有人把它们“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其不良后果则是：“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鲁迅在这三者的关系问题上，并未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自然体现了他的审慎和犹豫。但他还是对阶级时代的文学表达了如下观点：文学中没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每个分子“都带”着阶级性，尽管并非“只有”阶级性。⁽⁴⁾也就是说，阶级性是无所不在的，即便有共同性存在，阶级性也在其上打上烙印。所以阶级性是笼罩一切的特性，虽然它并非一切。这一观点甚至同时带出了他对自己此前长期赞同的托洛茨基的反对。⁽⁵⁾1930年，当鲁迅加入“左联”之后，在和创造社联手狙击梁实秋的共同人性论时，他对跨阶级的共同人性使用了举例的解构方式：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⁶⁾

而本应成为后期创造社盟友、主力成员全是中共党员的太阳社，因为其革命文学提倡仍然秉持大革命时期的“情绪统一”主张，创造社以辩证法和阶级意识等学说为武器，马上对其进行了批判，二社进行了为期短暂但激烈异常的论争。论争的结果，是太阳社自我检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了既往主张，辩证法和阶级意识等词汇迅速进入了他们的理论系统。⁽¹⁾当后来蒋光慈写出诉诸人之普遍同情，而含混了阶级区分的《丽莎的哀怨》的时候，创造社的阳翰笙马上批评道：

……我们读了《丽莎的哀怨》，并感觉不到俄罗斯贵族的“强横卑鄙，傲慢幸福”，并感觉不出俄罗斯新兴阶级的应该兴起，以至于“无可压抑”；恰恰相反，我们只能感到作者所传染给我们的感情，是在激动我们去同情于丽莎的哀怨与悲愁，同情于俄罗斯亡国贵族的没落与沉沦，飘零与悲运！⁽²⁾

丽莎固然可怜，但身为白俄贵族，对她的“同情”便跨越了阶级的界限。那么，同情只施诸被压迫者呢？如果没有阶级性作为保证，则很可能沦为“肤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而这一点正是旧的革命文学亟待被肃清的残余，如周扬在1932年提倡文艺大众化时所言：

中国的革命文学作品到现在还是充满着“革命”的词藻的生硬的堆砌，“突变式”的英雄的纯粹概念的描写，对于被压迫者（很少是真正的无产者）的肤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含泪的讽刺。要肃清这些残余的要素，只有到大众中去，从大众去学习，产生健全的大众作品。所以文学大众化不仅不是降低文学，而且是提高文学，即提高文学的斗争性，阶级性的。⁽³⁾

四、结语

不论何种“革命文学”，均致力于调用情感资源，但革命文学诉诸情感的路径，在1920年代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早期革命文学，普遍诉诸“同情”这一情感机制，在“怜悯”与“合一”的跨语境合力（也包含着微妙的张力）中，实现文学与革命的有效互动。其立论，着眼于文学对普遍情感和人性沟通，强调文学作为普遍情感产物的特质，并强调文学表达的情感可以实现人性的“同情”——而且正是“同情”实现了革命文学的“永远性”。而在1928年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则从阶级性出发，把革命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奠基在物质决定论上，并进而将物质落实为阶级斗争，依据的是意识形态被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原理。文学也因而成为阶级分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表现，承载着彼此对立、不能互通的阶级情感，革命文学专指无产阶级文学。

相较而言，早期革命文学并不预设人性因素在阶级间的分裂，不倾向于认可革命文学映射了阶级之间的分裂，反而认为它促成了不同群体之间情感的融通，所以并不一定指向阶级文学。就对革命的宣扬而言，早期革命文学更注意文学的情感特性，似乎更有效力；但就对阶级理论的宣扬而言，则不具备阶级斗争原理所必需的元素，从而不能更有效地起到鼓动阶级斗争的作用，能力又明显不及后者。依此反观处于“革命文学”论争前端的创造社与太阳社的论争，即可明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取代“革命文学”成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主义文人普遍选择的时候，太阳社在论争中的失败，在思想逻辑上已然注定。经历对内和对外的双重批判之后，无产阶级文学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以一种必要的方式肃清“革命文学”中遗留的“同情”等“人道主义”残余，同时以一种必要的方式唤起并整理阶级内部的情感与意识，将成为日后不断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事业的重要内容。

注释：

1 “同情”的诸多义项，参见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第3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第117页；以及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274页。以《辞海》为基础编撰的《古代汉语大词典》，便去除了“同情”在《辞海》中“对于他人的遭遇或行为在感情上发生共鸣”的义项，显然认为这是其现代含义。参见徐复等编：《古代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06页。《近代汉语大词典》则只给“同情”列出“同谋共划”一种含义。参见许少峰编：《近代汉语大词典》，中华书局，2008年，第1861页。

2《瀚堂近代报刊》：<http://www.neohytung.com/>，《全国报刊索引》：<http://www.cnbkcsy.com/home>，最后检索日期为2019年4月17日。

3[英]合信：《手鼻口官论》，《遐迩贯珍》第8号（总第25号），1855年8月1日。按，此文选自英国传教医生合信（BenjaminHobson）所著生理学著作《全体新论》（原刊做《全体身论》，当误）。协助合信将该著译为中文的据说是广东南海人陈修堂。参见刘泽生：《合信的〈全体新论〉与广东士林》，《广东史志》，1999年第1期。《遐迩贯珍》1853年在香港创刊，计出33期，全部卷期中仅出现了这一次“同情”，可参见研究者为其编制的索引。[日]松浦章、[日]内田庆市、沈国威编著：《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另，标点为引者所加，下引近代报刊基本如此，不一一注出。

4《戒食鸦片烟时文》，《申报》第110期，1872年9月5日，第2页。

5鵝湖隱名氏：《请印辟疫解痧良方来札》，《申报》第69期，1872年7月19日，第3页。

6《英国近事（六则）》，《中西闻见录》第6号，1873年1月，第27页。

7《洗冤新说续稿（死人之年貌并图）》，《中西闻见录》第14号，1873年9月，第5页。

8《文相薨逝》，《申报》第1262号，1876年6月7日，第2页。

9为善最乐斋主人：《乞助赈银》，《申报》第1668号，1877年10月1日，第3页。

10京都元魁拯溺会同人：《来稿照录》，《申报》第3413号，1882年10月31日，第3页。

11沪上寓公：《劝输晋赈》，《申报》第1878期，1878年3月21日，第3页。

12(1)芜湖广仁局：《劝收埋枯骨兼育婴施诊启》，《申报》第3335号，1882年8月14日，第9页。

13(2)《上海燧昌局自来火牌子新例减字说》，《申报》第4543号，1885年12月5日，第9页。

14(3)据《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检索日期为2019年4月19日。

15(4)《芳徽并志》，《申报》第8139期，1895年12月15日，第4页。

16(5)棣华书屋：《论女学》，《申报》第1203期，1876年3月30日，第1页。

17(6)《生儿不肖》，《申报》第2349期，1879年11月13日，第2页。

18(7)参见梦髯居士：《读惜花外史〈秋怀四章〉，不禁有同情之感，漫赋两律，录呈点铁，并乞高昌寒食生正》，《申报》第4899号，1886年12月3日，第10页；乞巧轩主：《读悞半生〈绮怀〉诗，不禁有同情之感，率和一律呈政》，《申报》第5061号，1887年5月21日，第3页。

19(8)笔者以“同情感”和“同情之感”为关键词检索了《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http://www.ding-xiu.com>)和《中国基本古籍库》(<http://dh.ersjk.com>)，仅在前者搜到两例含“同情之感”的句子，一例来自1931年的《民国青县志》，含义与今日同；一例来自明代的《易象大旨》，含义大体也在传统范围内。检索日期：2019年4月19日。

20(9)中国之新民（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续第十七号）》，《新民丛报》第19号，1902年10月31日，第3页。

21(10)内明：《心理学纲要》，《新民丛报》第37号，1903年9月5日，第57页。

22(11)参见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345页。

23(1)《宪政平议》（未署作者），《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27日，第16页。

24(2)独头：《俄人要求立宪之铁血主义》，《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6日，第25-26页。

25(3)社员：《日俄战记》，《新民丛报》第52号，1904年9月10日，第119-120页。

26(4)饮冰（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新民丛报》第89号，1906年10月18日，第31页。

27(5)依据为《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和《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日期：2019年4月20日。

28(6)主要依据《瀚堂近代报刊》和《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检索日期：2019年4月20日。

29(7)[日]佐藤贡悦、[韩]严锡仁：《中日韩同字异义小辞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180页。另，英文 sympathy 也具有支持和赞同的含义。

30(8)日语中“同情”虽没有“支持”的含义，但日语有至今还在使用的“同情スト”一词（可直译为同情罢工，スト即罢工的略写），意思是劳动者为了支援其他正在罢工的劳动者而举行的罢工，同情在其中有较鲜明的支持意味。参见日本大辞典刊行会编集：《日本国语大辞典（缩刷版）》第七卷，小学馆，1980年，第1188页。当然，同情スト其实是对 sympathystrike 的翻译。

31(1)望道：《反抗和同情》，《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18日，第1版。

32(2)采真、望道：《怎样做‘劳动者底同情’？》，《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29日，第4版。

33(3)佛突（陈望道）：《同情和合一》，《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月9日，第4版。

34(4)晓星：《同情心和自卫心》，《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23日，第4版。

35(5)冲虚：《同情》，《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2月3日，第3-4版。

36(6)《同情的寻觅》(未署作者),《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2月3日,第3版。

37(7)樵子:《同情心底魔鬼》,《民国日报·平民》第122期,1922年9月30日,第4版。

38(8)比如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第一事”“须言之有物”的第一个要求便指向“情感”;周作人认为,文学的起源即是作者的“感情表现”,感情与理性调和,才能生出“大人类主义”的人的文学;茅盾虽然认为新文学更重视社会性,但也认为新文学表达的个人情感是“全人类共有的真情感的一部分”,书写个人情感的目的是获得“社会的同情,安慰和烦闷”。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2卷第5期,1917年1月1日,第2页;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一月六日在北京少年学会讲演》,《晨报》,1920年1月8日,第7版;沈雁冰:《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松江暑期演讲会编辑:《学术演讲录(第一二期合刊)》,新文化书社,1926年,第15页。

39(1)西谛(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号,1921年7月30日,第1页。

40(2)代英:《文学与革命(通讯)》,《中国青年》第31期,1924年5月17日,第14页。

41(3)参见[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

42(4)蒋鉴:《请智识阶级提倡革命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6月18日。

43(5)秉丞(叶圣陶):《“革命文学”》,《文学旬刊》第129号,1924年7月7日。

44(6)许金元:《为革命文学再说几句话——第一百二十九期〈文学〉上一篇杂谈底读后感》,《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7月12日,第2页。

45(7)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11月6日,第3页。

46(1)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太阳月刊》第1期,1928年1月1日。关于蒋光慈的文艺思想,参见拙作:《蒋光慈前期文艺思想探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47(2)钱杏邨:《麦穗集》,落叶书店,1928年,第1-2页。

48(3)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民国日报·文学》第3期,1925年5月18日,第3页。

49(4)成仿吾:《批评与同情》,《创造周刊》第13号,1923年8月5日,第3页。

50(5)成仿吾:《艺术之社会的意义》,《创造周报》第41号,第3页。

51(6)成仿吾:《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1日,第3页。

52(7)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6日,第6-7页。

53(1)鲁迅:《文艺和革命》,《语丝》第4卷第7期,1928年1月28日,第34页。

-
- 54(2) 参见宋彬玉、张傲卉等：《创造社 16 家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 年，第 307 页。
- 55(3)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 2 号，1928 年 2 月 15 日，第 13 页。第一个“不是”原文为“不要”，径改。
- 56(4) 参见拙作：《再论后期创造社与福本主义之关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6 年第 2 期。
- 57(5)(6) 李初梨：《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我们月刊》第 2 期，1928 年 6 月 20 日，第 2、3 页。
- 58(7) 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一回）》，《拓荒者》第 1 卷第 1 期，1930 年 1 月 10 日，第 331-332 页。
- 59(1)(2) 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一回）》，《拓荒者》第 1 卷第 1 期，1930 年 1 月 10 日，第 339、338-339 页。
- 60(3) 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拓荒者》第 1 卷第 2 期，1930 年 2 月 10 日，第 684 页。
- 61(4)(5) 冯乃超：《人类的与阶级的——给向培良先生的〈人类底艺术〉的意见》，《萌芽月刊》第 2 期，1930 年 2 月 1 日，第 36、33 页。
- 62(6)(7) 弱水（潘梓年）：《谈现在中国的文学界》，《战线周刊》第 1 卷第 1 期，1928 年 4 月 1 日，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282、283 页。
- 63(1) 黄药眠：《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流沙》第 5 期，1928 年 5 月 15 日，第 24-25 页。
- 64(2) 西谛（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 9 号，1921 年 7 月 30 日。
- 65(3) 力次（程沙力）：《注射与反应》，《萌芽月刊》第 5 期，1930 年 5 月 1 日，第 320-321 页。
- 66(4) 恺良、鲁迅：《通信·之二》，《语丝》第 4 卷第 34 期，1928 年 8 月 20 日，第 46-47 页。此文鲁迅收入文集时改题《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 67(5) 参见拙作：《鲁迅阶级文学论述的转变与托洛茨基》，《现代中文学刊》2011 年第 3 期。
- 68(6)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30 年 3 月，第 77-78 页。
- 69(1) 参见拙作：《两种马克思主义诠释模式的遭遇——解读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 年第 3 期。
- 70(2) 华汉（阳翰笙）：《读了冯宪章的批评以后》，《拓荒者》第 4-5 期，1930 年 5 月 10 日，第 1676 页。
- 71(3) 起应（周扬）：《关于文学大众化》，《北斗》第 2 卷第 3-4 期，1932 年 7 月 20 日，第 434 页。